

现代汉语复合词造词的“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

曹 儒, 张道新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语义特征选择”机制是汉语复合词造词的基础性机制,其基本内容是一个复合词的内部形式和词形的构建,并非使用对象语义结构中的全部语义特征而是焦点式地提取个别语义特征。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造词者的主观性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造词者选择什么语义特征、用什么语素构建词形、用什么方式反映内部形式、语素的多少等方面并没有语言社团的约定性,因而引发了等义词、词长变化、词义直解度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在揭示这种机制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现象进行了理据性分析,并指出了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关键词:复合词;造词;语义特征;词形;词长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8)02-0103-07

一、引言

现代汉语复合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复合词的语素有两种基本文字形态,一种是汉字,如“教育、路由器、电子计算机”等,另一种是字母或字母加汉字,如“H 股、 γ 射线、DINK 家庭”等。前者的语素特征比较明显,每个汉字都是一个语素,后者中的字母部分不论字母数量多少,意义上都是独立的(如 γ 、H)或整体的(如 DINK),所以应视为一个语素。我们在讨论中所指的复合词就是这样两种词形的复合词。

复合词的造词活动存在着认识一个对象、形成语义结构、选择语义特征、构建内部形式、选择语素构建词形的复杂过程。人对对象的认识成果是语义结构的来源,而选择语义特征则是造词的真正开端,后续的内部形式和词形的构建都以此为依据。

任何一个造词对象都存在由众多语义特征构成的语义结构,它是构建内部形式和词形的语义材料。语素作为复合词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将语义结构物化为语言符号形式的材料。在构建内部形式和词形时,语义特征和语素的使用并非随意,而是存在着一个对语义特征进行焦点式选择的机制,我们称之为“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以下简称“特征选择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产生的内部形式,只是词的语义结构中众多语义特征的一小部分,加之造词者选择焦点有别、反映内部形式的语素选择不同等因素,势必引发诸如等义词、词长变化、词的直解度等一系列现象。不过,从目前的文献看,这种机制及其引发的词汇现象并未引起重视,因而,本文着重尝试揭示这一机制,并对相关现象进行分析,目的是为复合词的造词提供理论参考。

收稿日期:2017-07-11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研立项“基于知识扩散理论的海外汉语传播策略研究”(WF201783614)

作者简介:曹 儒(1976-),女,辽宁盘锦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词典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张道新(1965-),男,辽宁营口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语义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二、“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是复合词造词的基础性机制

人只要认识一个客观事物,就必然为之造词以便称说,而造词的前提是依据对象的知识系统构建起语义结构。所谓语义结构,是一个对象的各种语义特征的组织情况^①。人们在说话时都遵循经济性原则,即表达尽量用时少,在单位时间里用语尽量少而精,这一原则意味着词形应尽量简短。所以,构建词形时,对词义的表达只能“简言”而不能“详述”。那么,如何用“简言”来构建复合词的词形呢?

(一)“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的基本内容

复合词词形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存在“语义特征选择机制”,即从对象的语义结构中选择某些语义特征,为内部形式和词形提供直接的语义材料,或者说,构成一个复合词的语素所反映的意义只是对象的某些而非全部语义特征^②。

人关于某一对象的语义特征是很多的,甚至是难以穷尽的,有的源于科学知识,有的源于素朴经验,有的则源于主观评价。例如,关于“计算机”,我们可以凭借直觉列出这个对象的许多语义特征:

{[时间:发明时间;制造时间;使用时间…][空间:发明地;产地;使用地…][形状:整体几何形状;局部几何形状…][状态:整体颜色;局部颜色;质感…][数量:整体大小和重量;局部大小和重量;电压;交易价格…][结构:原理;用材;能源;零部件…][主体:发明者情况;生产者情况;使用者情况…][功能:应用范围情况;功能情况…][性质:对象类别;技术水平情况…]}

要把这些语义特征都用词形反映出来是不现实的,在经济性原则作用下,只能选择一小部分进入词形用以代表全部语义特征,以使词形简便实用。所以,在选择时,人们将焦点集中在某些语义特征上,把相应语素转化为词形。“计算机”的词形,被选择的语义特征只有两个,一是[功能:计算],二是[类属:机器];“计算”反映功能语义特征,“机”反映类属语义特征,其他语义特征未入选。由此例可见,词形

的形成存在着一个语义特征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几个主要特性:第一,对象的语义结构是词形形成的根本来源或依据;第二,词形的语素义通常反映语义结构中的某些语义特征;第三,入选到词形中的语素代表着对象的全部语义特征,人们从词形可联想到其他语义特征;第四,经济性原则对词形的长度有制约作用。事实上,这种特征选择机制无论在单纯词还是复合词的构词中都存在。

单纯词包括单音节的和多音节的两类。单纯词中有一些是音译外来词,如“卡、啤、吧、瓦特、牛顿”等,是用汉字字音音译的,汉字与词义之间无必然的反映关系,可用其他音同或音近汉字来表示,汉语的音译外来词的词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只是规定性而非逻辑性。与之不同,汉语固有的单音单纯词,如“山、天”等,汉字词形与意义之间存在着逻辑性,在造词之初就隐含着“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

汉字的造字法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明显地体现着特征选择机制,即在对象的众多语义特征中,选择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在字形上反映出来。如:“月、雨、心、牛”等象形字选择对象的整体或局部的形状特征;“本、末、朱、刃”等指事字选择对象的空间、结构等特征;“休、武、取、益”等会意字选择对象的运动特征;“鹰、鹅、鸭、猫”等形声字选择对象的类属特征。

复合词摆脱了造字法使用线条、图形、笔画或偏旁构成词的原始特征,完全利用已有的语素组合成新词,因而,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尤其是语素与语义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例如,“火车”的词形,选择了该对象的结构和类属特征,“火”反映此对象的动力特征,记作[结构:蒸汽],“车”则反映类属特征,记作[类属:车]。再如,“竞走”的词形分别选择方式特征和运动特征,分别记作[方式:竞赛][运动:走]。

可见,汉语的造字和造复合词都存在以语义结构为基础,焦点式地选择个别语义特征以构建字形词形的机制。这一机制可视为造字和造词的根本理据和逻辑特征。

①曹儒,张道新.词义结构与词语组合的意义形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20.

②张道新,董宏.现代汉语词义范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61.

(二)“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的焦点差异

对语义特征的焦点式选择,不同的造词者会有不同的焦点,对语义特征的取舍必然不同,所构建的内部形式也注定有别,这在词形上必然使反映同一对象的词形产生差异,从而形成等义词。刁晏斌(2000)曾对海峡两岸的词汇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有一类词是“异形同实”,即词形不同而所指对象相同^①,如“导弹”与“飞弹”“自行车”与“脚踏车”“方便面”与“速食面”“全景电影”与“360度电影”“京剧”与“国剧”“太空梭”与“宇宙飞船”等,这种现象就是由焦点的差异造成的。例如:

“导弹”与“飞弹”,是海峡两岸对同一种武器的不同命名。“导弹”词形是由结构和类属特征形成的,内部形式记作[结构:制导装置][类属:炸弹],“导”反映装有制导、控制飞行装置的结构特征,区别于无控制飞行装置的炮弹;“飞弹”则是由运动和类属特征形成的,内部形式记作[运动:飞行][类属:炸弹],“飞”反映自主飞行的运动特征,区别于用火药发射的炮弹。

由于两岸相隔日久,特征选择的焦点难免很大,词形差异不可避免,而这种词形差异的现象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会发生。例如,“发霉”与“长毛儿”,指称同一种生物现象。前者选择运动和主体两个特征,“发”反映产生这一运动形式,记作[运动:生],“霉”反映霉菌这一运动主体,记作[主体:霉菌];后者的“长”反映的也是一种运动形式,记作[运动:生],而“毛儿”则反映一种类似绒毛的视觉状态特征,记作[状态:绒毛状]。

在此,我们顺便谈一下婉词。洪成玉(2002)说,“有时候一些听起来不太文雅、不太吉利的话,需要表达而又不便于直接表达,只好选用间接、委婉而又能为人所理解的话来代替”,于是出现了婉词。如何能“婉”?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变换语素,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对象的其他语义特征,构建新的内部形式,用意义优雅或礼貌的语素构成新的词形。洪成玉举例说,“厕所”这个词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在有些场

合不直接说“上厕所”,而说“上洗手间”或“净手”^②。从特征选择的视角看,“洗手”“净手”选择的是与上厕所有关的其他语义特征,记作[运动:洗][客体:手]。可见,婉词的形成也是词形变化的结果,特征选择也是其基本机制。

总之,由于语体、方言、语言艺术取向以及语义特征选择焦点等方面的差异,会使同一对象的语义结构出现不同的词形,这是同一语言中存在异素等义词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见,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现有的复合词都可存在等义词。

三、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与复合词的词形反映方式

对语义特征的焦点式选择,为内部形式提供了直接的语义材料,在此基础上,还要用语素构成词形才能进入语言应用。词形既是对象语义结构的物化形态,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影响这种表达方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特定对象知识系统的丰富程度、造词者的语言艺术取向、雅俗语体的限制等,这些因素最终都会被整合为创制词形的方式。从现代汉语复合词词形的总体上看,词形对内部形式的反映方式主要有本义化、隐喻化等类型。

(一)词形对内部形式的本义化反映

所谓本义化,是指在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的基础上,使用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来反映内部形式的复合词创制方式。这是复合词词形构建的基本方式。如“飞机、国货、白菜、皇冠、番茄、土豆、红绿灯、信号灯、铝合金、混凝土、麻辣烫、路怒症”等,其中的每一个语素都直接使用本义或基本义来反映内部形式中的语义特征。例如:

“国货”内部形式可记作[空间:本国][类属:产品],“国”的意义为本国,“货”的意义为货物,直接反映内部形式在空间和类属等两个范畴的语义特征。

“飞机”内部形式可记作[运动:飞][类属:机器],“飞”的意义是飞行,“机”的意义为机器,直接反映内部形式在功能和类属等两个范畴的语义特征。

^①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26.

^②洪成玉.谦词敬词婉词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7.

“麻辣烫”内部形式可记作[状态:触觉:麻][状态:味觉:辣][状态:触觉:热]，“麻”的意义为麻的感觉，“辣”意义为辣的感觉，“烫”意义为热的感觉，直接反映某种菜肴在触觉、味觉等两个范畴的三个语义特征。

“路怒症”内部形式可记作[空间:道路][运动:怒][类属:病]，“路”意义为在道路上，“怒”意义为恼怒，“症”意义为病症，直接反映内部形式在空间、运动和类属等三个范畴的语义特征。

本义化的反映方式使词形的语素义与内部形式的语义特征形成直接的反映关系，词义的透明度或直解度较高。例如，对“国货”一词，仅从语素义的加合就可概略地解释词义。这种方式是比较朴素的反映方式，是复合词词形构建方式的主流。

(二)词形对内部形式的隐喻化反映

隐喻化，是指在语义特征进行焦点式选择的基础上，用表示其他对象的语素来反映造词对象内部形式的创制复合词的方式。与本义化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具有显著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智慧特征。语言艺术特征体现在词形语素的跨范畴应用上，表达智慧体现在对抽象、不易传达的思想、情感、事物的表达策略上。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汉字语素虽然数量有限，却能在古代、现代乃至未来表达无限的意义，不仅如此，从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角度来讲，隐喻化省去了造字的麻烦，使有限的汉字语素承担起更多的表达任务。

隐喻化作为一种对内部形式的反映方式，其认知过程是：在特征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先萃取对象的某些语义特征，然后用表示其他范畴对象的语素表达出来。隐喻化的认知过程不仅要关注造词对象的内部形式，而且还要关注其他对象的语义特征，进而确定不同对象之间的语义关联。例如，“脑海”，《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为“脑子(就思想、记忆的器官说)”，即所指对象为思维、记忆等活动，也就是说，造词者认为“脑子像大海一样有广大的空间”。造词者所构建的语义结构应有[空间:脑中][运动:思维;记忆][数量:信息:巨大][客体:知识;旧事]等语义特征，同时，“海”的语义结构有[数量:体积:巨大]的

语义特征，并认为这两个对象在数量范畴的语义特征具有相似性，于是，以[巨大]为基础建立脑子与大海之间的相似性，并以“海”之名指称[巨大]之属性。对于造词者来说，脑子这个对象假如存在上述语义结构，在词形语素选择上就会有更多选项，完全可用“中、里、间”等语素进行本义化表达，然而，语言艺术和表达智慧提供了词语跨范畴使用的条件，于是，“脑海”这个词形就构建起来了。从现有的复合词看，常见的隐喻化方式有：

一是实体化。使用实体语素，把较为抽象的语义特征表达出来。在此类复合词中，实体语素虽然使用实体之名，但表达的却是某种语义特征，即“以名指属”^①。例如，“铁案”中的“铁”本为一种金属之名，但在此不是指称铁而是表示铁的坚硬、不易改变的状态特征，记作[状态:触觉:硬][评价:不易改变]。实体语素通常用于反映抽象或不易传达的时间、性质、状态、程度、数量、结构、关系等范畴的特征。例如：“首航、周末、岁尾、末班车”等，用“首(头)”等所指对象的空间位序特征表示时序意义；“光阴、黎明、黄昏”等，用光的状态特征表示时间意义；“金领、虎将、鼠辈、地沟油”等，用“金”等所指对象的评价特征等表示性质意义；“冰凉、火热、漆黑、碧绿、油滑、绵软、雷鸣”等，用“冰”等所指对象的温度、色泽、质感、音量等状态特征表示程度意义；“海量、天价、人海、蜗居”等，用“海”等所指对象的数量特征表示数量意义；“水酒、石女、鼎立、笔锋、入门”等，用“水”等所指对象的状态、结构等特征表示结构意义，“肝胆、手足、鱼水情”等，用“肝、胆”等所指对象的关系特征表示关系意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实体之名的语义结构所蕴含的语义特征是很丰富的，因此，对一个实体对象语义特征进行多视角的开掘和利用，会导致不同复合词在使用同一实体之名做语素时出现语素义不同的现象。以“水”为例，“水酒”是在酒的结构属性范畴取浓度意义，表示酒的浓度低；“水货”是在运输的空间属性范畴取水路意义，表示水路；“水银”是在汞的状态属性范畴取液态意义。等等。这种现象表明，将一个对象进行实体化表达时，如何认识实体之名所反映的语义特

①张道新,董宏.现代汉语词义范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27-229.

征是造词和释义的根本前提。

二是数量化。数量是人皆有之的观念,是隐喻的重要材料。使用诸如“一、三、九、十、百、千、万”等表基数的语素和“成、率、度、指数”等表程度的语素,把不具有数量意义或数量意义不显著的对象表达出来,这种方式多用于表达对象的程度、范围等语义特征。例如,“八成、十分、千万、万万、万一、百分之百”等表示程度意义,“四周、四处、六合、八方”等表示空间范围,“百年、千秋、万岁”等表示时间范围。此外,常用的“半吊子、半路(夫妻)、回头率、满意度、幸福指数”等也是如此。

三是空间化。空间是可感知的具象对象,用空间元素隐喻其他对象具有形象性。用“上、下、内、外、里、表、中、旁、长、短、高、低、薄、厚、深、浅、宽、窄、远、近”等表空间的语素,把抽象对象的语义特征表达出来,这种方式多用于表达心理空间意义,“心上、宽心、旁人、远祖、长夜、短期、高端、浅薄、表亲、内省”等均如此。例如,“心上”是指抽象的心理世界或内心,用“上”这个方位语素,就使精神对象产生物理空间感;“远祖、短期”等是将时间特征空间化;“高端、低端”等是将对地位的评价特征空间化。

四是知觉化。人对事物的知觉有共性,明暗、甘苦、温暖、寒冷、疼痛、饥饿、憋闷、轻重、软硬、恶心等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共同知觉,使用表示知觉意义的语素可形象地表达某些抽象意义,如“黑帮、暖男、辣妹、断肠、心疼、心酸、心寒、头疼、渴望、煎熬、恶心、性饥渴”等。例如,“断肠”表达对象为思念之苦,这种痛苦可直接使用本义化表达,如“非常想念”,然而,在语言艺术取向的作用下,造词者却选择了人类共有的断肠之剧痛来传达,从而更能唤起人的同感;“心疼”表示怜惜的心态,用心的疼痛传达怜惜之情,也可唤起同感。口语中常说的“想死你了”的“死”,以及“牙疼、雷人、想吐、晕、腻”等,事实上也是知觉化的表达方式。

隐喻化反映方式,增强了基本语素的表达功能,提升了语言表达的境界,不过,还应看到语素对内部形式的反映具有曲折性和模糊性的一面。有些语

素,如实体语素的隐喻,往往会导致语素的多义性,如“樱桃口”的“樱桃”“黑社会”的“黑”“明白”的“白”“雪白、雪亮、雪糕、雪山”中的“雪”等。所以,就造词和用词而言,这并非一种理想的方式,我们认为造词的最高境界应是尽可能直接、概略地反映对象的语义结构,词形具有很高的直解度,然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语),词形的直解度与反映方式的曲折性之间存在的这一矛盾似乎难以调和。

四、语义特征选择机制与复合词的词长

词长,指的是词形的长短^①。现代汉语词通常以单音节、双音节为主,因而,所谓的词长是以单、双音节为基本参照系而判断的。词长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首先,音节数量。有单音节的,如“人、电、目、卡”;有双音节的,如“山脉、卡片、葡萄、欧姆”;有多音节的,如“打秋风、转基因、达·芬奇、众志成城、哺乳动物、奥林匹克、可口可乐、柴可夫斯基”等。其次,语素数量。有一个语素的,如“山、人、葡萄、奥林匹克”;有两个语素的,如“电子、氢气、革命、经济”;有三个语素的,如“炒鱿鱼、打秋风、闭门羹、奥运会”;有更多语素的,如“风力发电机、非典型性肺炎”等。

词长是音节、语素累加的结果,音节量和语素量都会引发词形长短的变化。因而,词长的变化取决于音节量和语素量两个方面,不过,这两个方面对于以单个汉字语素为基本表意单位的复合词来说,语义价值是不同的,进一步说,音节量的增加所导致的词长加长,并不都意味着语素量的增加,而以汉字语素构成的词形,由于每个音节都表达意义,这样的词形加长,等于语素量的增加。这种差异表明,词形的长短对于词的语义结构来说,只有语素才是内部形式的反映者,而音节汉字不论多少,只有构成语素之后才能与内部形式发生反映关系,此时的每个音节汉字与内部形式不单独发生关联。例如,“电视”的每个语素都是特征选择的结果,与“电视”的内部形式有关联,而“奥林匹克”有四个音节汉字,每一个都不能与内部形式发生任何关联。

^①周春.论词汇单位及其长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1):35.

(一)词长变化的影响因素

除却上述音节数量因素,词长是语素累加的结果。这种累加受制于特征选择机制和意义区别动因两个方面。

词形的形成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特制词形,如“人、兽、鸟、草、木、车、氢、氦、锂、硼、镭、苯、电视、手机、计算机”等是专为某种对象而创制的,往往成为基本范畴词,能为进一步创制复合词准备语素;二是语素累加词形,是在基本范畴词的基础上增加表示特征意义的语素而创制的,如“平板电视”是在基本范畴词“电视”的基础上增加特征性语素创制的。两种情况并非处于隔绝状态,事实上,特制词形的词是某个范畴的代表,是基本范畴词,累加词形是在基本范畴词上不断增加区别性语素而形成的,同时还会成为同范畴的新生对象的基础范畴词。现代汉语复合词就是语素累加而成的。语素累加有两种基本因素,一是语义特征选择,二是对象区分。

语义特征选择机制是认知因素,在复合词的词长上,表现为对语义特征提取的数量,提取的越多,意味着进入词形的语素越多,词形会随之变长,相反,提取得越少,则意味着进入词形的语素越少,词形会相应地变短。这种认识仍属于表面化的,而从认识的深层看,词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认识存在因变关系。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认识的事物种类和认识的广度深度都是有限的,相对于现代汉语词而言,词形也是较短的,多数是单音形式。在现代,人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认识深度不断加深、分类不断精细,这使得词形出现了双音节乃至多音节的总趋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修饰限定性语素的增加。例如:“电视机”是指一种现代科技产品,在此基础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视机的技术性分类越来越多,相应地出现了“电子管电视机、晶体管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液晶彩色电视机,平板等离子彩色电视机、平板液晶彩色电视机”等词语,这些词语都是以复合型中心语素“电视机”为基础增加限定性语素的结果。

对象区分是表意目的因素,在复合词词长上的作用表现为对同范畴中的不同对象进行差别化表达。同范畴的对象通常在某个语义特征上存在同质性,如“歼击机、轰炸机、客机、运输机”等复合词属于

共同的基本范畴——飞机,也就是说类属语义特征相同,但是在功能特征上则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语言上必然采取差别化表达,以显示不同功能飞机的意义;同样,如果以“轰炸机”为基本范畴词,那么,功能范畴也会出现差异。例如,在语义结构中出现了功能特征[用于战略轰炸],因而,为了区别于[用于战术轰炸],就需要在词形上继续增加反映功能特征的语素,构成“战略轰炸机”,由于又进一步出现差异,如[远程],语义结构中就出现了空间特征的差别,词形上就必然出现反映这种异于[近程]的语素,构成“远程战略轰炸机”,再进一步,如果这种轰炸机是隐形的,在语义结构中就出现了运动形式的差异,会出现运动特征[隐形],在词形上就构成“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等等。

显然,上述这两种因素,前者属于认识层面,从中可见词长与认识的因变关系,后者属于语言层面,反映着对不同对象进行表达的差别化需要。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在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创制上是共同发生的,这有别于在词形上脱离以基本范畴词为语素的特制词形造词倾向,如古代汉语中对“看”这个范畴内的不同运动形式有不同的词,向前看的为“盼”,向远看的为“眺”“望”,等等,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导致汉字量的增加,而现代汉语复合词创制中的这两种因素,可使人在不造新字的条件下仍能创制新词。

(二)词长变化对词义直解程度的影响

词长变化有两种形态,一是加长,二是缩短。这两种形态的性质不同,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有逻辑性,而后者逻辑性不显著,甚至是非逻辑的。

第一,词形加长是对象语义结构变化和范畴化的结果。同一个范畴内的次范畴对象在不断发展,由于要标示下位范畴与上位范畴的隶属或衍生关系,就需要使用范畴中的代表性词,而要标示下位范畴的属性差异,就必须增加区别性语素,这样就引发了词长的增加。“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言说电话时指的是办公室或家庭里的有线电话,当手机出现后,电话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词不能显示差别了,于是产生了“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有线电话”和“无绳电话”“座机”和“手机”等词来表示两种对象的对立,而当手机出现了很多款式之后,相应地出现了很多包含显示差别成分的词,如“直板手机”“翻盖手机”“音乐手机”“滑盖手

机”“智能手机”“非智能手机”等。

第二,词形缩短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产物。缩短有两种情形,一是语言缩略,二是话语缩略。首先,语言缩略,是在造词之初就以特征选择机制而创制的词,如“电话、火箭”等。语言缩略虽受制于词的音节数量要求而使语素量尽可能减少,但在提取语义特征时,往往有表意的目的意识,让构成词形的语素尽量反映语义结构,这在客观上使得词形中的每个语素都与内部形式保持反映关系。其次,话语缩略,是在语言表达阶段依据经济性原则而对词形较长的词的简省。话语缩略尽管也力争遵循特征选择机制,但很大程度上也存在对话语素选择的随意性,尤其是减掉那些与语义结构密切相关的核心语素。例如,“人民代表大会”被缩略为“人大”,如果说“人”尚与“人民”有一定语义关联的话,那么,“大”与语义结构之间不存在语义关联,进一步说,不能反映“大会”的语义结构,而“人代会”的每个语素则与语义结构之间的反映关系稍显更直接一些。

对于全称词而言,词形的缩短意味着语素的减少,而语素的减少就意味着对词的直解度降低。话语缩略本质上是以牺牲与语义结构有反映关系的语

素为代价的,由于对话语素与语义结构之间的反映关系的忽视,导致这样的缩略词直解度降低。因而,对缩略词的解读往往要唤回全称词形,以获得充足的语素。由于词形语素与语义结构之间存在反映关系,对一些以本义语素构造的复合词,通常可以借助词形而对词义有基本的概略的诠释,即所谓的“望文生义”。词形越长,意味着语素越多,对语义结构的反映程度就越高,直解的可能性也越大,反之,词形越短,语素越少,语素对语义结构的反映程度就越低,直解度也相应降低,甚至不可直解。

五、余 论

复合词是现代汉语最基本的词形,这是语言应用的历史性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作为复合词造词的机制,是构建内部形式和创制词形的认知基础,不过,这种用个别语义特征表达词的语义结构的方式,难免对反映词的语义结构的精确度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语素选择和词长处理上使词形更精确地反映词的语义结构,值得进一步研究。

A study on the “focused selection of semantic feature” mechanism of compoun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Cao Ru, Zhang Daox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semantic feature” mechanism is the basic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and its basic conten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form and word form of a compound word, not using all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object i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but extracting individual semantic features in a focused way. This mechanism is essentially a subjective mechanism of a word maker. In such an arrangement, what semantic features the word maker chooses, what morpheme is used to construct a word form, what method is adopted to reflect the internal form and the quantity of morphemes are all concepts with no conventionality of language societies, thus triggered a series of noteworthy phenomena such as synonym, the variation of word length or the direct solution degree of word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is mechanis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phenomena and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is mechanism.

Key words: compound words; coinage words; semantic features; word form; word length

〔责任编辑:李宝贵〕